

《皇清職貢圖》所見清朝 對回疆地區的認知與書寫*

曲 強**

摘 要

《皇清職貢圖》中有「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三組圖涉及回疆地區。由於哈密和吐魯番歸屬清朝較早，被清朝視作內地，相關畫片一度被劃入陝甘部分。法藏本《皇清職貢圖》中存在「徇」、「回」混用現象，可動態體現清朝統一西域過程中對待回人態度的轉變。由於編纂人員對哈密與安西的歷史關係認知不足，導致「安西廳哈密」一圖滿文標題出現重大錯誤，所指群體出現矛盾。清朝統一西域過程中，大小和卓占據喀什噶爾、葉爾羌，負隅頑抗，加之兩地與喀喇沙爾缺乏對清朝的職貢歷史，被排除出《皇清職貢圖》，反映出清朝對回疆各地與其歷史關係和認知的具象呈現。

關鍵詞：皇清職貢圖、新疆、清朝、哈密、吐魯番

2025年1月11日收稿，2025年5月16日修訂完成，2026年1月27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4-17世紀西北邊疆區域史研究」（批准號：63252018）階段性成果。論文獲兩位審查專家的寶貴建議，謹致謝忱。

** 作者係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講師。

一、前 言

《皇清職貢圖》的繪製，是清乾隆時期一項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這一系統性工程可以追溯到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大金川後，乾隆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令四川總督策楞繪製當地男女畫像，此後又擴展到其他地區，分別形成了《雲南民族圖考》、《四川省番圖》等圖冊。在此基礎上，乾隆二十二年正月《職方會覽》圖冊告成，共 550 幅。¹ 後在《職方會覽》基礎上又繪製了《廣輿勝覽》並不斷增補，至乾隆二十六年定稿傳世，這便是《皇清職貢圖》手卷繪製前的最後草稿。《廣輿勝覽》的使命完成後，《皇清職貢圖》開始逐漸增補新內容，直至乾隆末年。

《皇清職貢圖》分彩繪本、寫本、刻本三個系統，寫本源於繪本，刻本源於寫本。² 彩繪本分繪卷和冊頁，兼有滿漢文題記，繪卷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另有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乾隆四十四年謝遂摹本。冊頁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下文簡稱法藏本）和私人手中。據研究，乾隆五十五年以前宮中冊頁形態的《皇清職貢圖》僅有法藏本，³ 因此法藏本冊頁是目前公開的最早版本。寫本有《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本兩種，刻本有乾隆四十五年武英殿本、嘉慶十年（1805）武英殿重刻增補本、翻刻本等，⁴ 寫本和刻本只有漢文題記。

目前學界對《皇清職貢圖》的研究比較豐富，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其一是版本，如莊吉發對該書進行了文獻學研究，轉寫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謝遂摹本的滿文圖說並進行詳細校注。⁵ 畏冬發表的三篇論文釐清了《皇清職貢圖》的創製及乾嘉兩朝增補的詳細歷史過程。⁶ 黃金東發表的三篇

1 楊揚，〈《廣輿勝覽》與《皇清職貢圖》的關係〉，《美術》666(2023.6): 111。

2 黃金東，〈《皇清職貢圖》版本流傳考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5(2023.5): 116-117。

3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2012.3): 1-76。

4 黃金東，〈《皇清職貢圖》版本流傳考論〉：117。

5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6 畏冬，〈《皇清職貢圖》創制始末〉，《紫禁城》1992.5(1992.5): 8-12、〈乾隆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增補〉，《紫禁城》1992.6(1992.6): 23-38、〈嘉慶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3.1(1993.1): 44-46。

論文細緻地考證《皇清職貢圖》版本源流，著重考證彩繪本和刻本創制過程、資料來源。⁷ 楊揚利用尚未公開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廣輿勝覽》，結合檔案史料，探討其繪製過程，以及與《職方會覽》、《皇清職貢圖》的關係。⁸ 其二是以《皇清職貢圖》作為民族志資料，根據繪畫探討所繪各個國家、族群的服飾、民俗等，這類論文涉及赫哲族、蒙古族、貴州土司、瑤族、壯族、河湟各族、土族等。其三是挖掘《皇清職貢圖》書寫的歷史，或所體現的觀念，如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認為《皇清職貢圖》是為滿足貿易官員的興趣製作的，除了日期和一些片段外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其編排順序主要從朝貢的歷史優越性和地理位置決定，而且剔除了構成清帝國的成員——漢、滿、蒙、回、藏。⁹ 與之相對，Laura Hostetler 則認為《皇清職貢圖》既包括清廷直接控制下的非漢族群體，也有自認為完全獨立的國家，更多的是貿易夥伴。而排列順序是由外到內、由東向西。¹⁰ 《皇清職貢圖》宣揚了清朝的中心地位，還反映並記錄了清朝內外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¹¹ 賴毓芝則探討圖像與政治的關係，以其製作、增補的過程探討圖像順序背後隱藏的政治觀念，特別是關注《皇清職貢圖》與現實的關係，並認為《皇清職貢圖》的第一卷是萬國來朝下帝都的呈現。論文還探討了《皇清職貢圖》的歐洲根源，探討該圖體現的西洋世界。¹² 齊光著重分析《皇清職貢圖》中繪製的主體，並通過滿漢文圖說，特別是一些滿文詞匯研究其對民族、國家等概念的表述等等。¹³ 而專門研究回疆部分

7 黃金東，〈《皇清職貢圖》刻本考述〉，《文獻》2020.6(2020.11): 137-148、〈彩繪本《皇清職貢圖》版本研究〉，《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0.10(2020.10): 60-66、〈《皇清職貢圖》版本流傳考論〉: 115-123。

8 楊揚，〈《廣輿勝覽》與《皇清職貢圖》的關係〉: 110-117。

9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33-34.

10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42.

11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49.

12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 1-76。

13 齊光，〈解析《皇清職貢圖》繪卷及其滿漢文圖說〉，《清史研究》2014.4(2014.11): 28-38。

的，僅見周軒〈《皇清職貢圖》中的西域史實〉一文，該文介紹與圖說有關的西域史事，但屬於一般概論性質的文章，缺乏對史事具體深入研究。¹⁴ 總體而言，學界對《皇清職貢圖》中回疆部分關注不足，特別是缺乏對圖說、所繪群體和所體現的認知與觀念的深入探討。本文力圖解決先行研究未曾關注過的三個問題，即回疆三圖繪製次序，代表的地域和人群，所體現清朝的認知和態度，以求從另一個視角觀察清乾隆時期統一西域進程中，對回疆地區、群體認知和書寫的轉變過程。

二、回疆三圖繪製次序探析

《皇清職貢圖》中的回疆三圖指的是「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三組，由於「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分回目和回人兩對，因此回疆三圖共有四對畫片，共八幅。由於法藏本《皇清職貢圖》已全部在網路公開，¹⁵ 且形成較早、兼具滿漢文題記，有一些不同於其他版本的現象，對於研究《皇清職貢圖》的形成和所體現的觀念變遷十分重要，因此列法藏本回疆三圖漢文圖說如下：¹⁶

14 周軒，〈《皇清職貢圖》中的西域史實〉，《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5.2(2016.6): 23-30。

15 法藏本《皇清職貢圖》可參見 <https://catalogue.bnf.fr/ark:/12148/cb444768402> (2025.5.15 上網檢索)，下文所列文字及圖像均出自該網站。

16 法藏本漢文圖說中，回字還使用了回、囧等異體字，且無明顯規律可循。本處錄文保留這些異體字原貌，但在正文中均將不帶犬字旁的該字統一作「回」。另外，筆者還將法藏本滿漢文圖說與臺北故宮謝遂款摹本、乾隆朝武英殿刻本、四庫薈要本做過對照，有一些差異。如「安西廳哈密」漢文圖說臺北本「飲食風俗」作「飲食衣物」。「肅州金塔寺魯古慶」殿本「魯古慶、皮禪、土魯番」作「魯克察克、闕展、吐魯番」；臺北本「髮垂」作「垂髮」，「沙雞翎」作「沙雞羽」。「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圖中，法藏本將「回」字寫作「徇」；臺北本「互闡」作「互關」，係錯字，殿本、四庫本作「和闡」，為乾隆中期後的規範譯法。臺北本、殿本「於滇」作「於闡」，臺北本「室廬」作「田廬」。「莫雜帕爾」Mudzapar 臺北本滿文作 Modzapar。總體而言，回疆三組圖說漢文差異較小；「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滿文圖說差異較大，「烏什庫車阿克蘇」滿文差異極小。筆者還對比了其餘西域圖，惟「安集延回目」兩版滿文圖說相異處稍多，其餘圖說幾乎完全一致，說明兩版滿文圖說

安西廳哈密回民

哈密回民，即唐時回紇苗裔，明置哈密衛，嗣服屬於準噶爾。本朝定鼎，回長奉貢襲封。至康熙年間西路用兵，為設駐防武臣，屹為重鎮。其人男戴紅頂黑簷帽，衣長領齊袖衣。婦人披髮四垂，戴瓜皮小帽，衣用各色褐布，飲食風俗俱同內地回民，歲貢哈密瓜等物。其瓜州五堡回民，則係雍正年間投誠安插者，服飾與哈密同。



圖一 清佚名《皇清職貢圖》冊頁安西廳哈密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2,25）

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回民

魯古慶、皮禪二族回民俱土魯番部落，亦唐時回紇苗裔也。本朝雍正四年投誠內附，安插於肅州之金塔寺、威魯堡，給田耕種，以資生計。男子戴綠頂皮帽，衣褐布長領衣。婦人髮垂兩絡，戴紅帽，斜插沙鷄翎。衣用紅綠等色布，足靴以布帶縱橫繫之。其飲食風俗亦同內地回民。

的修訂情況各異。但由於最早的手卷殘本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尚未公開，因此要系統研究滿文翻譯過程還面臨著困難，故本文暫不討論滿文圖說的形成等相關問題。



圖二 清佚名《皇清職貢圖》冊頁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2,26）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徇目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徇人，西域徇部也。又有互闐五城，即古于滇國。其徇目謂之和卓木，各城有伯克以轄之。乾隆二十三年，烏什城霍集斯伯克遣子莫雜帕爾來京瞻仰，頭裹錦巾，頂插金條如花葉狀，行則瑤然有聲。錦衣錦帶，履花草鞞，蓋徇俗貴者之服飾也。婦人辮髮雙垂，耳貫珠環，錦鑲衣，花草鞞。至徇民男婦則小白帽褐衣，大約與吐魯番相似。地有城郭村落室廬，土產五穀瓜菓。男勤耕作，女知織紵。牲畜駝馬牛羊皆有之。



圖三 清佚名《皇清職貢圖》冊頁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2,19/2,20)

另有「烏什、庫車、阿克蘇等處徇人」、「烏什、庫車、阿克蘇等處徇人婦」一組，無圖說。

討論回疆三圖繪製次序，不能不考慮其前後的西域諸圖，筆者將法藏本《皇清職貢圖》中涉及的西域圖依圖序排出，並將法藏本漢文圖說的

「回」字寫法舉例列出。其中「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回民」以上屬於第二冊，「愛烏罕回人」以下屬於第三冊，兩者之間用雙橫線分隔：

表一 法藏本《皇清職貢圖》西域諸圖概況

題名	圖說「回」字舉例	與清朝發生關聯的時間	推定繪製時間 ¹⁷
伊犁等處台吉	或招徠人耕種	乾隆二十年……遂隸版圖	乾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二年一月
伊犁等處宰桑			
伊犁等處民人	咸仰食於徠人		
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蘓等處徠人	伊犁貿易徠人	乾隆二十年平定伊犁，其徠人……輸誠向化，赴熱河朝覲	
哈薩克頭目		乾隆二十年……先後率眾歸誠，各遣子姪赴京瞻仰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
哈薩克民人			
布魯特頭目	亦徠種也	乾隆二十三年……先後歸誠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
布魯特民人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徠目	西域徠部也	乾隆二十三年烏什城霍集斯伯克遣子……來京瞻仰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處徠人			
拔達山回目		乾隆二十四年秋，大兵追擒逆回兩和卓木至其地，其酋……輸誠內屬，遣使赴京瞻仰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
拔達山回民			
安集延回目		乾隆二十四年秋，大兵平定喀什哈爾，其目……納款歸誠	
安集延回民			

17 指最初版本的繪製時間，而非繪入或裱入法藏本冊頁的時間。

題名	圖說「回」字舉例	與清朝發生關聯的時間	推定繪製時間 ¹⁷
安西廳哈密回民	哈密回民，即唐時回紇苗裔	康熙年間西路用兵，為設駐防武臣，屹為重鎮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前
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回民	魯古慶、皮禪二族回民俱土魯番部落	本朝雍正四年，投誠內附	？
愛烏罕回人	愛烏罕極西回部也	乾隆二十七年……遣使……貢馬	乾隆二十八年一至二月
霍罕回人		乾隆二十四年……其頭目……遣使赴軍營恭請聖安，二十七年遣使入貢	
啟齊玉蘇部努喇麗所屬回人	平定回部	乾隆二十七年其頭目……遣使入貢	
啟齊玉蘇部巴圖爾所屬回人		乾隆二十七年遣使入貢	
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	時與鄰部回人同至伊犁等處貿易	乾隆二十七年其頭目……遣使入貢	

由表格可見，各圖排序大體依照歸附清朝或與清朝建立官方往來的時間先後。但「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所繪人群歸附最早，分別在康雍年間，卻被插入安集延、愛烏罕之間，顯得格格不入，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考證各圖最初版本的繪製年代。

據楊揚論文，「伊犁等處台吉」、「伊犁等處宰桑」、「伊犁等處民人」、「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獮人」四組圖最初版本應收入了較早形成的《職方會覽》，繪於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前。¹⁸ 而根據乾隆朝起居注記載，哈薩克使臣肯集哈拉等於乾隆二十二年九月覲見，¹⁹ 《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有「軍機處傳旨：著畫哈薩克人像貌，欽此。」²⁰ 的記載，這顯然是為繪圖準備素材。另據《活計檔》記載，「愛烏罕回人」、「霍罕

18 楊揚，〈《廣輿勝覽》與《皇清職貢圖》的關係〉：113。

1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16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卷16「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戊戌」，頁415。

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造辦處檔》第2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558。

回人」、「啟齊玉蘇部努喇麗所屬回人」、「啟齊玉蘇部巴圖爾所屬回人」、「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畫稿，都繪成於乾隆二十八年年初「筵宴初次投降愛烏漢回子」之時。²¹「烏什庫車阿克蘇」漢文圖說提及「乾隆二十三年，烏什城霍集斯伯克遣子莫雜帕爾來京瞻仰」，圖說對莫雜帕爾衣著的描述與該圖男像完全一致，說明該圖所繪正是莫雜帕爾。而據起居注，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狃部降人霍集斯伯克之子漢咱吧爾入覲」，²²這裡的「漢咱吧爾」就是「莫雜帕爾」，說明該圖最初版本應繪於此時。拔達山、安集延使臣於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覲見，《皇清職貢圖》中的相關畫面應也在此時繪製。由此可知，上表所列西域各圖，大多繪製於遣使、朝覲之時。唯有「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存在諸多疑點，其繪製緣由、過程不見於史料記載，而且所繪群體歸附清朝甚早，「安西廳」更是只存在於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前的行政建置，因此至少「安西廳哈密」圖被夾在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繪製的拔達山、安集延之後，乾隆二十八年年初繪製的愛烏罕之前，不合情理。

楊揚的論文中透露了一條不應忽視的重要信息，即《廣輿勝覽》中「安西廳哈密」與「肅州金塔寺魯古慶」兩組圖列於陝甘部分，在「肅州番目溫布所轄黑番」之前，與我們現在看到的《皇清職貢圖》各種版本均不同。²³細察「肅州番目溫布所轄黑番」前後所繪族群可知，他們皆歸附於康雍年間，無論是所處地理方位還是歸附時間，都與「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相近，而與其他西域諸圖差異較大。因此筆者認為，陝甘部分諸圖以及「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的最初版本可能繪製較早，至少應該早於其他西域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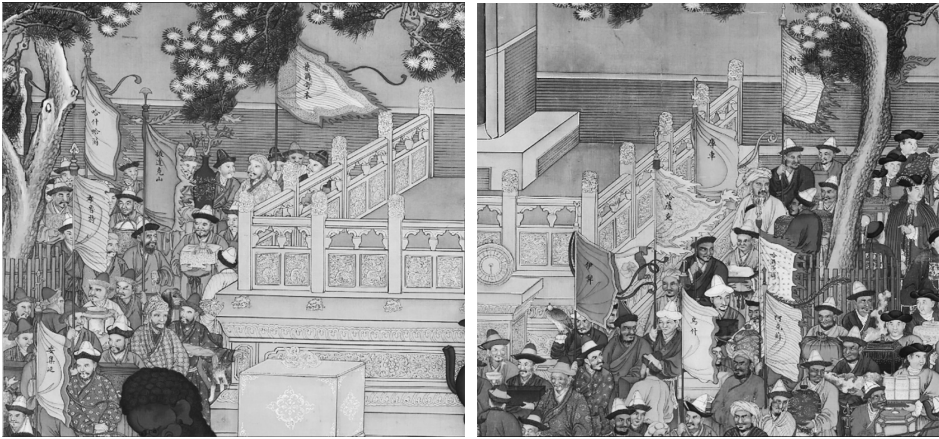
那為什麼在《廣輿勝覽》中二圖歸入陝甘部分呢？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應當是這些圖繪製於同一時期。據《活計檔》記載可知，《廣輿勝覽》是隨著繪製逐步裝裱的，因此繪製順序與裝裱順序是密切相關的。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造辦處檔》第 28 冊，頁 46、49。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17 冊，卷 17「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辛巳」，頁 633。

23 楊揚，〈《廣輿勝覽》與《皇清職貢圖》的關係〉：113。

除了時間因素外，在觀念上，二圖歸入陝甘部分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哈密、吐魯番被清朝視為「內」，與回疆其他地區不同。與《皇清職貢圖》性質類似，最早繪於乾隆二十五年的《萬國來朝圖》中，並無哈密、吐魯番人身影，卻有葉爾奇木（葉爾羌）、喀什哈爾（喀什噶爾）、烏什、阿克蘇、哈爾沙爾（喀喇沙爾）、庫車、和闐使臣各舉旗幟（見圖四）。同樣，西藏、蒙古也不列於圖中，這說明在清廷看來，行札薩克制的哈密、吐魯番兩地與蒙古更為接近，而與伯克制的回疆其他地區不同，因此才被視作「內」，而不入「萬國」之列。比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就記載清朝大臣認為哈密「回子風俗，與蒙古無異」，²⁴ 建議在哈密行札薩克制。此後康熙帝則稱：「哈密已經編置佐領，即與內地無異」，²⁵ 可見行札薩克制成為哈密被視作「內」的重要條件，乾隆朝在額敏和卓統轄的吐魯番東部地區行札薩克制也是同理。這樣才能解釋《皇清職貢圖》和《萬國來朝圖》中所繪群體產生出入的現象。



圖四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絹本設色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24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1708〕武英殿刻本，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編號：434851），卷 46，葉 9。

25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癸巳」，頁 5589。

但由於《皇清職貢圖》主要以族群性質歸類，因此在依據《廣輿勝覽》既有畫片繪製法藏本冊頁時，就具有了調整畫片排序的條件和需要。可能是因注意到陝甘諸族群在圖說中被稱為「番民」、「土民」，與「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的「回民」不同，故而改併入回部。然而，若按歸附清朝的時間排序，「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應插入「伊犁等處台吉」之前，西藏諸圖之後，這樣就與前後諸圖的族屬、地域不合。若按地域排序，則應插入「烏什庫車阿克蘇」之前，這樣不但與之前的「布魯特」地理位置相隔遙遠，更在時間線上讓前後諸圖產生斷裂。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將「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移入了法藏本第二冊末尾，既避免了割裂以上諸圖所形成的時間線，又有收尾的作用。法藏本中「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的收尾作用表現尚不清晰，只是與之後的「愛烏罕回人」、「霍罕回人」、「啟齊玉蘇部努喇麗所屬回人」、「啟齊玉蘇部巴圖爾所屬回人」、「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中間插入了乾隆帝講述「愛烏罕」、「霍罕」、「啟齊玉蘇」、「烏爾根齊」與清朝交往的滿漢文「御識」。而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謝遂繪本中，「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之後有「臣謝遂恭畫」落款，又移入了原在法藏本第一冊末尾的劉統勛和詩、原在法藏本第二冊開頭的梁詩正和詩，其後才是滿漢文「御識」，²⁶ 這更加明確地表明「肅州金塔寺魯古慶」處於收尾處，與「愛烏罕」以下有明確的界限。至於四庫寫本和內府刊本，更是將「愛烏罕」以下諸圖移至卷九，與卷二末尾的「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徹底分離。²⁷ 這表明在諸版本中，「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與之後的「愛烏罕」、「霍罕」、「啟齊玉蘇」、「烏爾根齊」之間有明確界限，這種界限在較早形成的法藏本中還比較模糊，但在此後的諸版本中變得明晰起來。這種界限表明，「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與回疆、哈薩克、布魯特、拔達山、安集延等處回人同屬一組，不可分離。儘管他們之中有的內屬與清朝，有的屬

26 參見《清謝遂職貢圖（一）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中畫 000046N00 0000000）。

27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3。

於外藩，性質不盡相同，但均屬於與清朝內地關係較為密切，而且與清廷建立關係較早的群體。因此，將「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移入法藏本第二冊末尾，最大程度上減小了對該冊畫片次序的割裂，又有收尾作用，這才形成今天《皇清職貢圖》各種版本的排序，也是「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看上去與其前後畫片格格不入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見，《皇清職貢圖》中畫片的次序並不能準確反映畫片最早版本繪製時間的先後。而「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二圖的特殊次序以及歸類調整，正反應了哈密、吐魯番二地在清朝經略西域過程中的特殊地位。

三、相背之間：獬、回混用背後的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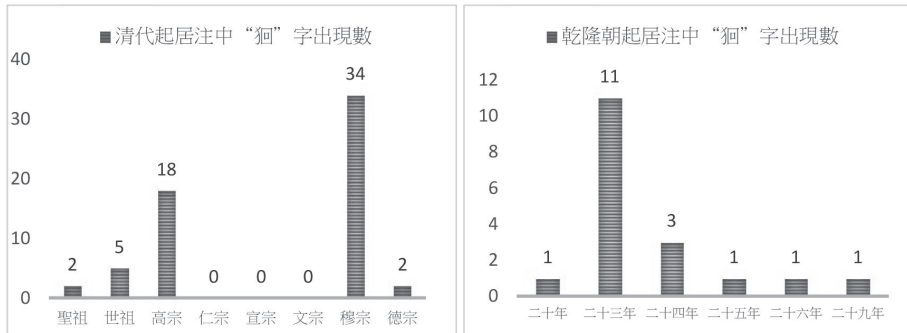
重新審視法藏本《皇清職貢圖》，還有一個特殊現象不容忽視，那就是「拔達山」圖及以後皆用「回」字，而以前諸圖包括本文討論的「烏什庫車阿克蘇」圖皆用「獬」。那麼在法藏本中為何二字混用，其背後反映了怎樣的態度呢？

首先要明確「獬」的使用究竟是書寫者的個人行為，還是官方規定下的政治、文化行為。法藏本筆跡和繪畫風格不一，加之多次補繪，應出自眾手。且不同圖說「獬」字使用的異體字也不盡相同，也說明非一人繕寫。考慮到《皇清職貢圖》是乾隆帝親自指揮的文化工程，繕寫者不可能率性而為。因此獬、回混用應是遵循某種原則，故意為之。清代文獻中「回」字及相關異體字最常用，「獬」則有明顯的貶低、歧視色彩。從《皇清職貢圖》中族群名稱來看，用犬字旁者並非個例，特別是在西南各族群中集中出現，如黑羅羅、狝、土獠等。因此犬字旁主要有不順服和不開化兩種意味，「獬」應當主要意味著不順服。而是否順服，正與清朝與回疆政治勢力之間的關係密切相關。

若獬、回二字在價值判斷上的分水嶺是順服與否，那麼在時間上的分水嶺又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應是乾隆二十四年末平定大小和卓事件。現存雍乾年間漢文檔案中，獬、回二字皆有使用，且無明顯規律可循，即

便歸附清朝並準備移入肅州的回民，也曾被稱「狃」。²⁸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提及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兆惠、楊應琚尚在奏摺中使用「狃」，此後該字便不再被使用。²⁹ 檢索清代起居注可知，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函送逆狃霍集占首級」³⁰ 前使用「狃」的情形較多，此後只有零星兩條。再次大量出現已是同治時期，與所謂回民起義有關。光緒朝兩條，均為補敘同治年間事。《清實錄》透露，乾隆帝曾下達過不許使用「狃」字的諭旨：

朕每見法司爰書，有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者，輒令改寫。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狃，亦令將犬旁刪去。誠以此等無關褒貶，而實形鄙陋，實無足取。況當海寓同文之世，又豈可不務為公溥乎。將此通諭知之。³¹



圖五 清代歷朝起居注中「狃」字使用情況統計 (數據來源：書同文古籍數據庫³²)

可見乾隆帝認為「海寓同文之世」既已實現，回部之人自然也都成為清朝

28 〈奏報安插土魯番簽鈔回子遷移口內事宜 (雍正 4 年 6 月 28 日)〉,「雍正朝宮中檔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故宮 025122)。

29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4.

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19 冊,卷 19「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丁巳」,頁 8。

31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第 21 冊,卷 983「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頁 21629。

32 「書同文·清代歷朝起居注檢索系統」,「書同文古籍數據庫」網站, <https://guji.uni-han.com.cn> (2023.12.2 上網檢索)。

的臣民，無須再用歧視性「狃」字表示不順服。這種以是否臣服來劃定性質的做法，十分符合乾隆帝的華夷觀。他曾斥責大臣稱內札薩克蒙古和西藏為「夷」的行為，指出與清朝處於對立中的準噶爾、俄羅斯、金川才可稱為「夷」。³³ 其道理和原則與狃、回用法別無二致。

法藏本用例亦與以上推測相合。伊犁諸圖到「烏什庫車阿克蘇」圖，無論是初次繪製，還是據《廣輿勝覽》已繪畫片摹繪入《皇清職貢圖》法藏本冊頁，應都在乾隆二十年到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間。此時回疆尚未平定，先有阿睦爾撒納反清，隨後準噶爾諸鄂拓克掀起反清浪潮，大小和卓雖尚未明確舉起反旗，但已開始與反清勢力秘密聯絡，蠢蠢欲動。平定大小和卓過程中，清朝對西域回人普遍抱有諸多疑慮，即便是早已歸服清朝者，仍有提防之心。而且庫車、阿克蘇等地的阿奇木（地方行政長官）曾成批追隨小和卓反清，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這樣記載：

隨其行走之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瑪瑪特額敏（Mamadamin）、葉爾羌伊什罕噶瑪呼里（G'amahūlii）、阿克蘇阿奇木伯克阿布薩塔爾（Abusatar），其弟阿布都爾耶木（Abduryem）、阿布都哈里克伯克（Abduhalik Bek）、庫車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克勒木（Abdukerem）、阿散素丕（Asan Sopi）、沙雅爾舊伯克阿布拉什木（Abulsim）。³⁴

可知當時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庫車、沙雅地方官員全部追隨小和卓。布魯特（吉爾吉斯）人當時並非統一的政治體，而是存在許多部族，他們與大小和卓的關係十分複雜，一部分布魯特人也曾追隨其抗拒清朝，³⁵ 因此在繪製《皇清職貢圖》時仍用「狃」字。「拔達山」以下繪

33 曲強，〈從滿文四書五經政治類詞彙譯法的演變看清朝官方意識形態的變遷〉，《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12(2020.2): 177-178。

34 〈定邊將軍兆惠奏報詢問烏什地方布魯特頭目嘎岱是否知曉小和卓情形折（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收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33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61-62。文中滿文檔案係筆者自譯。

35 可參見〈靖逆將軍雅爾哈善等奏報詢問額敏和卓侄子米爾瑪特小和卓等情形折（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30冊，頁298。

於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以後，西域平定，乃全部改作「回」。「安西廳哈密」、「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繪製較早，其最早版本究竟使用哪種回字還不得而知，這是由於《廣輿勝覽》和最早的《皇清職貢圖》手卷尙深藏博物館中，並未刊布，因此在這裡不能武斷地推測，不過這兩組圖被摹繪入法藏本時肯定也在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以後，其中一條證據就是二圖次序，前文已經探討；另一條證據就是「回」字的寫法。至於《皇清職貢圖》的其他版本製作更晚，乃將犬字旁全部去掉，只有繪製較早的法藏本保留了兩種寫法。³⁶

從法藏本用字變遷可以看出乾隆時期對回疆的認知及觀念的變化，這種變化又與政治形勢的變遷緊密相關，反映了回疆地區被逐步納入清朝統治範圍過程中，清朝統治者對於回疆首領、回民的符號化態度，以及這種態度的轉變。這種態度背後的華夷觀念，既見諸回疆也見諸其他族群。而法藏本《皇清職貢圖》保留了這一演變過程，正式其重要學術價值所在。

四、歷史與現實：回疆三圖所指主體辨析

作為某一族群的具象化表達，《皇清職貢圖》所指群體本應清晰明確，但三圖圖說與其所指群體之間存在著不少錯位和模糊之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乾隆朝前期對回疆地區的認知。

「安西廳哈密」出現安西廳、哈密兩個地名。法藏本滿文圖說作「An Si Tinggin i kadalara Hami i hoise，意為安西廳所轄哈密的回子」，臺北本作「An Si Ting ni Hami i hoise irgen，意為安西廳的哈密的回子民人」，意指其表現對象為「哈密回民」，然而圖說中所謂「瓜州五堡回民」卻來自吐魯番，與標題不符。「肅州金塔寺魯古慶」法藏本滿文作「Su Jeo i Gin Ta juktehen, Lukcin i jergi ba i hoise，為肅州金塔寺、魯克沁等地的回子」，臺北本作「Su Jeo i Gin Ta Sy, Lu Gu King ni jergi aiman i hoise irgen，為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部的回子民人」，均將「肅州金塔寺」和「魯古慶」並列，又與「安西廳哈密」不同。

36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皇清職貢圖》手卷第二卷，告成應不晚於法藏本，但由於尚未刊布，無法得知其中回字寫法。

事實上，清前中期哈密並未大規模向內地移民。明萬曆朝以後，哈密一直歸屬於葉爾羌汗國，但 1696 年前後天山南北政治局勢劇變，南有葉爾羌汗國滅亡，北有稱霸一時的噶爾丹敗亡，回疆各地勢力紛紛尋找出路。康熙三十五年（1696）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歸附清朝，次年擒獻噶爾丹之子，清朝為其編設旗佐。應額貝都拉之請，清廷允准「伊子郭帕白克率一百人住紮肅州」，³⁷ 這一佐領歸理藩院與哈密札薩克管理，與肅州無涉。³⁸ 自額貝都拉歸附以來，哈密一直處在清朝穩固控制下，充當屯田基地和軍事重鎮，因此沒有大規模移民。而吐魯番的情況與之不同，葉爾羌汗國滅亡後，準噶爾扶持當地勢力統治。清朝初次攻占吐魯番是在康熙五十九年，阿喇衲在齊克塔木擊敗準噶爾，宣諭招撫。³⁹ 當地統治者歸附後，清朝即撤回巴里坤。不過策妄阿喇布坦隨機反撲，將部分回民遷往喀喇沙爾等地，「眾回人相率逃回，有準噶爾之人來追，眾回人並力殺退，見在魯克齊穆地方駐紮，共議以拖克拖麻穆忒為頭目。」⁴⁰ 由於準噶爾再犯，清軍乃於康熙六十年再次出兵，屯駐吐魯番。雍正四年（1726）清朝與策妄阿喇布坦議和、劃定邊界後撤出，先前歸附的頭目托克托瑪木特（即拖克拖麻穆忒）恐準噶爾報復，乃率回民六百五十人內遷，⁴¹ 被安置在肅州金塔寺、威魯堡。這是吐魯番回民第一次大規模內遷，即「肅州金塔寺魯古慶」圖中所說「本朝雍正四年，投誠內附，安插於肅州之金塔寺、威魯堡。」

吐魯番回民第二次大規模內遷發生在雍正十年。留在吐魯番當地的額敏和卓，頻遭準噶爾侵擾，不得不在雍正十年率眾內遷，「回民大小一萬餘口」⁴² 先抵達哈密，後東行至瓜州，雍正十一年被安置在新修建的瓜州五

37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 5 冊，卷 185「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己酉」，頁 4842。

38 王希隆、楊代成，〈清前期哈密、吐魯番維吾爾人遷居河西西部述論〉，《民族研究》2020.1(2020.1): 112。

39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 6 冊，卷 288「康熙五十九年八月甲子」，頁 4754。

40 同上註，卷 293「康熙六十年六月乙卯」，頁 4791。

41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第 7 冊，卷 45「雍正四年六月己丑」，頁 6540。

42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第 8 冊，卷 125「雍正十年十一月乙未」，頁 7638。

堡。⁴³這就是「安西廳哈密」圖中所說「其瓜州五堡回民，則系雍正年間投誠安插者，服飾與哈密同」，顯然指安西廳而非哈密，「服飾與哈密同」也表明他們並非哈密人。因此「安西廳哈密」圖包含了兩部分人，即額貝都拉家族統治下的哈密回民，和額敏和卓帶領下的安西廳瓜州五堡移民。顯然，兩版滿文圖說均翻譯錯誤。

為何滿文圖說將哈密和安西廳理解為所屬關係呢？這是因為清前中期哈密與安西關係十分複雜。雍正十一年置安西道，轄安西廳、靖逆廳，安西廳轄安西、沙州、柳溝三衛，靖逆廳轄靖逆衛與赤金所。⁴⁴瓜州五堡回民正處於安西廳同知的駐地瓜州，管理其事務的既有札薩克公額敏和卓，也有安西同知、安西總兵，甚至還有理藩院派出的章京。⁴⁵而哈密在安西廳轄境外，處於哈密札薩克管轄下。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大小和卓平定，清廷調整行政建制，裁安西、靖逆廳，將原安西同知移駐巴里坤，稱巴里坤直隸廳；將原靖逆通判移駐哈密，稱哈密直隸廳；原安西廳、靖逆廳轄地設安西府，仍歸安西道統轄，只不過將安西道也移駐哈密，一度稱哈密兵備道。⁴⁶可見安西管轄哈密已經是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以後的事了，但此時安西廳已被裁撤，變成了安西府。

因此，滿文圖說誤譯「安西廳哈密」，原因是初繪該圖時應在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以前，那時安西廳與哈密無管轄關係。但根據軍機處乾隆二十九年五月錄副奏片：「《職貢圖》冊頁內，遵旨添寫清字，今已繕寫完竣，恭呈御覽。」⁴⁷可知滿文圖說至乾隆二十九年才補完，因此可以推測滿文可能是後來翻譯的，而在翻譯這條圖說時，安西廳應已裁撤，安西道與哈密存在管轄關係，譯者可能對歷史不甚瞭解，以今度古，誤以為曾

43 王希隆、楊代成，〈清順康雍三朝對天山以南地方政權與地方勢力政策述評——以葉爾羌、哈密、吐魯番與清朝的互動關係為中心〉，《西域研究》2018.1(2018.1): 52。

44 胡恒，〈廳制起源及其在清代的演變〉，《文史》2013.2(2013.5): 262-263。

45 〈軍機大臣允祿奏請由理藩院派章京筆帖式管理瓜州吐魯番回子摺（乾隆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4冊，頁284-286。

46 魯靖康，〈清代新疆鎮迪道再探〉，《歷史地理研究》43.2(2023.5): 56。

47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奏職貢圖冊已遵旨添寫完清字進呈御覽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片，編號：03-0181-2087-031）。

經的安西廳亦管轄哈密。而且漢文「安西廳哈密回民」既可以理解為「安西廳的哈密回民」，也可理解為「安西廳和哈密的回民」，譯者誤選了第一種。總之，誤譯及未被糾正都是對安西、哈密兩地複雜關係不夠瞭解所致，法藏本滿文標題至少應該譯作 An Si Tinggin Hami i hoise，即「安西廳和哈密的回子」。

「肅州金塔寺魯古慶」圖說無誤，「肅州金塔寺回民」指托克托瑪木特率領的吐魯番移民，「魯古慶等族回民」指吐魯番東部回民。圖說舉魯古慶、辟展二地，主要是因為二地是吐魯番東部中心，是安西、肅州移民的故鄉，也是額敏和卓的出身地與勢力範圍。而吐魯番西部中心是吐魯番城，其首領莽噶里克到乾隆二十年才歸附清朝，且後來被誣告謀反被誅，⁴⁸他與清廷的關係遠遠比不上東部的額敏和卓那般緊密，故被忽略。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圖所指亦不明晰，圖說中還提到了和闐五城，即哈喇哈什、玉隴哈什、車噶、克里雅、塔克。⁴⁹說明該圖所指地域包括烏什、庫車、阿克蘇、和闐。除此之外，回疆還有那些區域未被提及呢？清代官書對回疆地區有多種劃分法，《西域圖志》為十分法，分為哈密、吐魯番、哈喇沙爾、庫車（兼轄沙雅爾）、賽喇木（兼轄拜）、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這是一種較細緻的劃分。《回疆通志》為八分法，即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吐魯番、哈密。《清實錄》中又有所謂四大城、四中城、二十三小城，四大城為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⁵⁰按以上幾種劃分，回疆三圖中未提及的至少還有三處：喀喇沙爾、喀什噶爾、葉爾羌。

《皇清職貢圖》中「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徇人」圖說雖提及葉爾羌和喀什噶爾：「伊犁貿易徇人，族姓不一，住伊犁之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與諸厄魯特貿易。又有阿克素、庫扯、葉爾青穆、哈什哈爾、呼騰等五種徇人，各居城堡，以耕牧為生。」但不能據此認為《皇清職貢圖》將葉爾羌、喀什噶爾納入了繪製範圍，理由有三。其一，該圖說主體明確

48 曲強，〈吐魯番伯克莽噶里克歸附始末考——兼論清朝對吐魯番的初步治理〉，《清史研究》2021.2(2021.3): 58、64-65。

49 清·和甯撰，孫文傑整理，《回疆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181。

50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第17冊，卷642「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戊寅」，頁16934。

指移居伊犁的回人。其二，圖說裡提及的「伊犁貿易獮人」實際指的是「伯德爾格」(bāzargān)，即波斯語「貿易者」的音譯；「阿克素、庫扯、葉爾青穆、喀什哈爾、呼騰等五種獮人」指的是「塔蘭奇」(tariyacin)，即蒙古語「種地者」的音譯。⁵¹ 他們大都是準噶爾從天山以南等地擄往伊犁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葉爾羌汗國後期。其三，這五種回人中阿克蘇、庫車、和闐已有專圖繪製，足以說明「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獮人」無法代表葉爾羌與喀什噶爾。

筆者認為，這三地有意被排除在外，而非遺漏，這與三地與清朝交往的歷史有關。早在雍正年間，喀喇沙爾附近就成了準噶爾小策凌敦多布的冬牧場，其所帶家口有五千戶之多，準噶爾還將大批擄獲的布魯特人遷至此地，⁵² 準噶爾的兩個鄂拓克——瑪呼斯和沙喇斯也在這裡活動。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命額敏和卓等赴喀喇沙爾搜剿瑪呼斯和沙喇斯部眾，至當年年底已在喀喇沙爾屯田。《回疆通志》稱：「準噶爾恃其強橫，佔據其地為牧場，回民不堪其擾，死絕逃亡，地遂空虛。」⁵³ 這樣一片空虛之地的重要性無法與烏什、阿克蘇、和闐等相提並論，而且又沒有當地首領與清朝「職貢」的經歷，故而被排除在外。

喀什噶爾、葉爾羌極為重要，葉爾羌汗國時期就是回疆中心，葉爾羌為國都，喀什噶爾為汗位繼承人的封地。但由於地處西陲，兩地統治者很少與清朝直接交往，明確見諸史料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順治年間，葉爾羌汗國阿布都拉哈汗用「葉爾羌汗」名號遣使奉表，但由於上次與清朝交往是以前其弟「吐魯番汗」名義進行的，因此清朝大臣「詰表異名違例」。使者對葉爾羌汗國分封制做了詳細介紹，並總結稱：「前葉爾羌汗遣其弟自吐魯番請貢，故表稱吐魯番汗名，今以葉爾羌汗為昆弟長，故表稱葉爾羌汗名。」⁵⁴ 然而《清實錄》在記載此事時，卻捨「葉爾羌汗」不用，稱

51 苗普生編，《清代察合台文獻譯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頁 545。

52 陳柱，〈準噶爾汗國對布魯特的征戰、防守與汗國內部的布魯特人〉，收入余太山、李錦繡主編，《歐亞學刊》新 9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 184-185。

53 清·和甯撰，孫文傑整理，《回疆通志》，頁 226。

54 包文漢、奇·朝克圖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 1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頁 694。

之為「吐魯番阿布都拉哈」，⁵⁵名實不符。筆者以為，原因可能是當時清朝堅持明朝舊制所致。清入關之初，基本全盤繼承了明朝的西域認知和朝貢規制。吐魯番與明朝多有交往，有戰有和，但也是最重要的朝貢、貿易地之一。而牙兒幹（葉爾羌）、哈失哈兒（喀什噶爾）則與其他地區一同歸入《大明會典》的「西域三十八國」之列，⁵⁶無論是重要性還是與明朝的交往經歷，遠遠比不上吐魯番。1514年葉爾羌汗國建立以來，所有遣使基本都來自哈密、吐魯番宗王，因此對於清朝來說，吐魯番遣使符合規制，亦有充分的歷史紀錄可供參考，葉爾羌則相反，因此編實錄時以吐魯番代指葉爾羌汗國，這也導致葉爾羌與清廷的這次直接交往沒有得到正確定位，也未進入清朝官方的回疆知識體系中，乾隆九年成書的《大清一統志》不載此事，便是明證。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五年，被噶爾丹拘禁伊犁十四年之久的葉爾羌汗國阿卜都里什特汗趁噶爾丹落敗，脫出投奔清朝，受到康熙帝的接見，並被護送返回故土。但阿卜都里什特汗沒能光復已經滅亡的葉爾羌汗國，而是被策妄阿喇布坦留在準噶爾。⁵⁷乾隆九年成書的《大清一統志》中出現「葉爾欽」，將其與琉球、俄羅斯、日本等共同歸入「朝貢諸國」，在其「建置沿革」中就記載了阿卜都里什特之事。⁵⁸事實上，阿卜都里什特作為葉爾羌的大汗，已經是十四年前的舊事，他投奔清朝的時候，葉爾羌汗國已經滅亡。《大清一統志》中的「葉爾欽」只是通過阿卜都里什特這位「舊汗」與清朝發生了一絲關聯而已，根本談不上與清朝有「職貢」的關係，而就是這細微的聯繫，也在阿卜都里什特返回西域後迅速斷絕。

1696年前後葉爾羌汗國滅亡後，回疆諸城各自為政，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由本土宗教、世俗首領統治，與清朝缺乏直接交往。大小和卓反清期

55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第3冊，卷103「順治十三年九月丁未」，頁2296。

56 清·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07〈主客清吏司·朝貢三·西戎上〉，頁94。

57 曲強、烏蘭圖雅，〈再論葉爾羌汗國阿卜都里什特汗與準噶爾的關係〉，《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25.3): 50-52。

58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清乾隆九年〔1744〕武英殿刊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編號：990080859280203941），卷355，葉36。

間，兩地既是其中心，也是其最後據點，正如《清實錄》所說：「其阿克蘇、庫車等處，系進兵道路。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乃其巢穴。」⁵⁹論在回疆西部地區的重要性，葉爾羌、喀什噶爾可並稱一二，不過它們歸屬清朝的過程異常艱難。清朝進軍過程中，大小和卓軍隊據守庫車，小和卓親自率兵援助，清軍在庫車進行了長時間的圍城戰，最終小和卓逃遁，庫車開城投降。雖然庫車歸屬清朝實屬被動，但庫車出身的伯克鄂對早在乾隆二十年就歸順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過程中建有功勳，成為深受清廷信任的回人首領，其家族也成為回疆地區的重要政治勢力。⁶⁰小和卓自庫車逃往阿克蘇後被拒之城外，阿克蘇歸順清軍。小和卓又來到烏什，但烏什伯克霍集斯早與清朝交好，更是擒獻達瓦齊的功臣，故而小和卓無隙可乘，再逃往葉爾羌、喀什噶爾。清軍雖圍繞和闐六城與和卓軍展開艱苦鬥爭，但早有多位當地伯克歸順清朝，並與清軍奮力據守和闐六城東部的哈喇哈什、伊里齊，最終迫使和卓軍放棄和闐全境。⁶¹因此，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四地，或早與清廷有所交往，或在戰爭中順利歸順清朝，唯喀什噶爾、葉爾羌兩地久攻不克。自乾隆二十三年九月清軍進軍葉爾羌，⁶²到次年閏六月大小和卓棄城西逃，清軍花了十多個月的時間攻取二城，期間兆惠還遭遇了三個月之久的黑水營之圍，清軍損失慘重，最終也未能擒獲大小和卓，使其逃往巴達克山。應當說，在清朝的認知中，葉爾羌雖在康熙年間與清朝有過一絲微弱的聯繫，但那早就成為隔代往事。清朝真正直面葉爾羌、喀什噶爾，還是在平定大小和卓的過程之中。但這兩地並無「輸誠向化」之舉，亦無「職貢」經歷，反而是「逆賊巢穴」，可謂乏善可陳，當然無法被收入《皇清職貢圖》中，才被有意排除在外，而只是在安集延、霍罕等畫片的圖說中作為地理參照點而提及。同樣因與清朝對立而被乾隆帝蔑稱為「夷」的準噶爾、俄羅斯、金川都被收入圖中，那是因為仍能在歷史上找出「職貢」的事例。喀喇沙爾、葉爾羌、喀什

59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第 15 冊，卷 551「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頁 15641。

60 清·和甯撰，孫文傑整理，《回疆通志》，頁 277-278。

61 同上註，頁 181、269。

62 《定邊將軍兆惠奏報烏什霍集斯伯克不知小和卓去向及向葉爾羌進軍折（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 33 冊，頁 52。

噶爾雖繪於《萬國來朝圖》，但與《皇清職貢圖》不列三地並不矛盾。儘管已有學者指出《萬國來朝圖》並非實景描摹，⁶³但它仍然意在「呈現現實」，而《皇清職貢圖》則意在呈現「歷史」。平定回疆後，三地歸屬清朝已是現實，故被繪於《萬國來朝圖》中。

五、結 論

《皇清職貢圖》作為清中期對內外諸族群、國家的具象化表達，能夠鮮明體現清朝對回疆地域、族群認知的變遷。從哈密、吐魯番的兩組圖次序的變化，到剔除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地，都可以看出清朝對於回疆內部各地重視程度不一，源於他們與清朝歷史關係的親疏。對於兩種「回」字的混用，又可動態體現清朝平定回疆過程中對於回人態度的變化。而「安西廳哈密」滿文標題的誤譯，並且長期未被糾正的現象，也可體現清廷對於回疆歷史變遷缺乏細緻的瞭解，更可以看出為彰顯「同文之治」而書寫的滿漢合璧圖說，其滿文部分的準確性根本沒有受到過重視和仔細審查，「同文」更近乎流於形式。正是由於法藏本編成較早，在與其他版本的對照中為這種變遷增添了動態性，可以視作一個絕佳的樣本。

然而，目前學界對《皇清職貢圖》具體畫片和圖說的研究還存在許多不足，其背後隱藏的觀念性內容還有很大的發掘空間。前文提到，柯嬌燕認為《皇清職貢圖》中缺少歷史信息，這種論述失之浮汎。通過本文對《皇清職貢圖》所涉回疆部分的研究可見，滿漢文圖說中不但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而且可以將此看作乾隆時期清朝官方對於回疆的書寫，即便是這種書寫中的翻譯錯誤，也能夠體現清廷對回疆地區的認知程度。柯嬌燕提出《皇清職貢圖》剔除了回人群體，也失之簡單。且不論其餘西域回人，至少《皇清職貢圖》沒有將回疆回人剔除在外，而且還將其分成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哈密、吐魯番的回人，他們歸順清朝最早，曾經移民內地，是清朝最為信任的群體，他們的首領——哈密的額貝都拉家族和魯克沁的額敏和卓家族都成為了回疆各地的高官，因此這兩組圖也繪製最

63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21-22。

早，甚至被歸入陝甘部分，直到後來才移入回部。第二個層次是烏什、庫車、阿克蘇、和闐回人，他們歸順較晚，對清朝曾經首鼠兩端，但其首領與清朝曾有職貢往來，在平定大小和卓過程中仍比較順利地歸順了清朝。即便如此，在書寫圖說時還是給回字加上了犬字旁，以表示對他們的態度。第三個層次就是真正被剔除出《皇清職貢圖》的喀喇沙爾、喀什噶爾、葉爾羌，這是因為他們或無職貢往來，或被動地被清朝納入統治，缺乏「輸誠向化」的經歷。在這三個層次之外，還有一些細節更加有趣，比如「肅州金塔寺魯古慶」一圖，為何只提及吐魯番地區東部，而將吐魯番城在內的西部剔除？這又與準噶爾扶植的吐魯番伯克莽噶里克與清朝的恩怨情仇有關。⁶⁴顯然，《皇清職貢圖》中繪製的人群十分複雜，體現的觀念和書寫的特點也不能簡單視作同質化的整體，期待有更多的學者能從多種角度對其作更加深入的解讀。

64 曲強，「札薩克公莽噶里克伯克的興亡：清朝與準噶爾對立中的吐魯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碩士論文，2020），頁 19-2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9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影印。
- 清·和甯撰，孫文傑整理，《回疆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18。
-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清乾隆九年（1744）武英殿刊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編號：990080859280203941。
-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造辦處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 包文漢、奇·朝克圖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 1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
- 《皇清職貢圖》，<https://catalogue.bnf.fr/ark:/12148/cb444768402>（2025.5.15 上網檢索）。
- 〈奏報安插土魯番簽鈐回子遷移口內事宜（雍正 4 年 6 月 28 日）〉，「雍正朝宮中檔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故宮 025122。
- 「書同文·清代歷朝起居注檢索系統」，「書同文古籍數據庫」網站，<https://guji.unihan.com.cn>（2023.12.2 上網檢索）。
- 《清謝遂職貢圖（一）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中畫 000046N00000000。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
-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奏職貢圖冊已遵旨添寫完清字進呈御覽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片，編號：03-0181-2087-031。
-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1708）武英殿刻本，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編號：434851。

二、近人論著

- 王希隆、楊代成 2018 〈清順康雍三朝對天山以南地方政權與地方勢力政策述評——以葉爾羌、哈密、吐魯番與清朝的互動關係為中心〉，《西域研究》2018.1 (2018.1): 40-55。
- 王希隆、楊代成 2020 〈清前期哈密、吐魯番維吾爾人遷居河西西部述論〉，《民族研究》2020.1(2020.1): 105-117。
- 曲 強 2020a 「札薩克公莽噶里克伯克的興亡：清朝與準噶爾對立中的吐魯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碩士論文。
- 曲 強 2020b 〈從滿文四書五經政治類詞匯譯法的演變看清朝官方意識形態的變遷〉，《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12(2020.2): 162-179。
- 曲 強 2021 〈吐魯番伯克莽噶里克歸附始末考——兼論清朝對吐魯番的初步治理〉，《清史研究》2021.2(2021.3): 54-65。
- 曲 強、烏蘭圖雅 2025 〈再論葉爾羌汗國阿卜都里什特汗與準噶爾的關係〉，《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25.3): 46-53。
- 周 軒 2016 〈《皇清職貢圖》中的西域史實〉，《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5.2(2016.6): 23-30。
- 畏 冬 1992a 〈《皇清職貢圖》創制始末〉，《紫禁城》1992.5(1992.5): 8-12。
- 畏 冬 1992b 〈乾隆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增補〉，《紫禁城》1992.6(1992.6): 23-38。
- 畏 冬 1993 〈嘉慶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3.1(1993.1): 44-46。
- 胡 恒 2013 〈廳制起源及其在清代的演變〉，《文史》2013.2(2013.5): 254-287。
- 苗普生編 2013 《清代察合台文獻譯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莊吉發 1989 《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陳 柱 2019 〈準噶爾汗國對布魯特的征戰、防守與汗國內部的布魯特人〉，收入余太山、李錦繡主編，《歐亞學刊》新 9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67-199。
- 黃金東 2020a 〈《皇清職貢圖》刻本考述〉，《文獻》2020.6(2020.11): 137-148。
- 黃金東 2020b 〈彩繪本《皇清職貢圖》版本研究〉，《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0.10 (2020.10): 60-66。

- 黃金東 2023 〈《皇清職貢圖》版本流傳考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5(2023.5): 115-123.
- 楊揚 2023 〈《廣輿勝覽》與《皇清職貢圖》的關係〉，《美術》666(2023.6): 110-117。
- 齊光 2014 〈解析《皇清職貢圖》繪卷及其滿漢文圖說〉，《清史研究》2014.4 (2014.11): 28-38。
- 魯靖康 2023 〈清代新疆鎮迪道再探〉，《歷史地理研究》43.2(2023.5): 55-67。
- 賴毓芝 2012 〈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2012.3): 1-76。
-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Millward, James A.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present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Towards Southern Xinjiang as Evidenced by the *Qing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Qu Qiang *

Abstract

The *Qing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皇清職貢圖 features three illustrations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Xinjiang: “Hami of Anxi Prefecture” 安西廳哈密, “Jintasi and Luguqing of Suzhou” 肅州金塔寺魯古慶, and “The Cities of Ushi, Kucha, Aksu, and Others”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 As Hami and Turfan came under Qing dynasty control relatively early and were thus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interior, their illustrations were initially categorized under the Shaanxi-Gansu section. In the edition of the *Qing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held by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the mixed usage of *hui* 徇 and *hui* 回 reflects the Qing’s evolving attitudes towards Muslim peoples dur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compiler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ami and Anxi led to a significant error in the Manchu title of the “Hami of Anxi Prefecture” illustration, creating contradictions in the depiction of the associated groups. During the Qing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persistent resistance of the Khwāja-i Jahān and Burhān al-Dīn in Kashgar and Yarkand, along with the lack of historical tribute relations between Kashgar, Yarkand, Qarashahr, and the Qing dynasty, resulted in their deliberate exclusion from the *Qing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This omission highlights the Qing’s selective per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various parts of the Southern Xinjiang.

Keywords: *Qing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Xinjiang, Qing dynasty, Hami, Turfan

* Qu Qiang, Lecturer,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